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GREECE**

John Bagnell Bury

[英] 伯里 —— 著  
陈昭佳 —— 译 晏绍祥 —— 审校

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希腊史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A HISTORY OF GREECE  
John Bagnell Bury

# 希腊史 I

[英] 伯里 著  
陈思伟 译 晏绍祥 审校



## 伯里和他的《希腊史》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

西方人撰写希腊史的尝试，最远也许可追溯到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的《历史》既是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也是希腊世界的通史。他的笔触上及传说中的米诺斯王，下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公元前 478 年）。那些居住在黑海、小亚细亚、爱琴海北岸、西西里和大希腊，以及北非地区的希腊人的历史，得到了与本土希腊人历史同等的对待。在他之后，虽然修昔底德的断代史传统一度受到青睐，续篇不断，但在埃弗鲁斯（Ephorus）和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的著作中，我们仍能看到通史传统的延续。可惜他们的著作都没有完整地流传到今天。埃弗鲁斯的著作仅有少数残篇，连轮廓都难以恢复。狄奥多鲁斯的著作也大多失传，但还能看出个大概框架。他的叙述上起希腊传说中的远古，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于西部希腊人的历史叙述尤详。

近代西方撰写古代希腊通史的努力，似乎始自 18 世纪的英国。在此之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Abbe de Mably）曾撰写《希腊史论》（*Observations on the Greeks*），罗林（Charles Rollin）的《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Egyptians, Carthaginians, Assyrians, Babylonians, Medes and Persians, Macedonians and Grecians*）中，也有关于古希腊史的系统叙述。不过前者更多地把自己阐发政治思想的噱头，后者大

多遵从古代文献,缺乏足够的历史批判精神。只有在英国,希腊史才真正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莫米利亚诺曾经提到,欧洲大陆上的学生阅读的希腊史,最初大多出自英国人之手。<sup>①</sup>最早的一种,就目前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可能是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托马斯·亨德(Thomas Hind)的著作。1707年,他出版了一部上起希腊的传说时代,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止的《希腊史》(*The History of Greece*)。他的著述体现出最初的历史批判精神,在序言中明确区分了传说时代和历史时期,并把古代奥林匹亚赛会开始的公元前776年作为希腊信史的开端,预示了19世纪中期格罗特(George Grote)的看法。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同样对传统持怀疑态度,对传说时代仅给予了很少的篇幅,第二章就到了斯巴达的莱库古改革。在他们之后,希腊史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和斯坦延(Temple Stanyan)先后出版了他们各自的《古希腊史》(前者为*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后者为*The Grecian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Philip*),苏格兰王室历史学家格利斯(John Gillies)也出版了两卷本的《古代希腊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在此之前两年,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的第一卷已经面世,到1810年该书8卷出齐,是为近代第一部多卷本古希腊通史性著作。因米特福德之书具有相当的学识,特别是其对民主政治的批评,颇合害怕法国革命的英国人口味,一度广受欢迎。虽然如此,这些著作对古代文献的批评仍嫌不足,而关于古代希腊史的下限,也是百花齐放,有写到希腊化时代末期的,有写到马其顿的腓力之死的,也有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个别的还有写到罗马帝国时代的。

---

<sup>①</sup> 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16.

19世纪历史学的专业化,资料的积累和专题性研究的拓展,让希腊史研究越来越专门和细致,对资料的批判,也愈益深入。反映到通史著述上,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有关著作的篇幅稳步增长,而对史料本身的研究,成为史学家的基本任务。桑沃尔(Connop Thirwall)的《希腊史》为8卷,已经对古代文献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怀疑,而且开启了为民主政治辩护的传统。但他过于持重,在讨论完民主政治的优点后,总不忘提醒人们它的弱点,导致叙述平淡,观点过于四平八稳,因而影响不够显著。格罗特(George Grote)的鸿篇巨著《希腊史》为12卷。格罗特最大的贡献,一是对资料本身的批判,直接抛弃了传统,公开宣布古代希腊的信史只能从公元前776年开始。二是为雅典民主政治辩护。他系统清理了古代作家在民主政治问题上的各种偏见,在智者运动、苏格拉底的审判、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策略与失败等主要问题上,都提出了与其前驱颇为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用莫米利亚诺的话说,此后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希腊史研究,基本围绕着格罗特展开,不是支持他的论点,就是与他论战。<sup>①</sup>

格罗特的巨著出版后,古希腊史的面貌的确与过去不同了。在英国,直到19世纪末,格罗特的观点基本左右着希腊史研究。海德拉姆(John Headlam)关于雅典抽签选举的著述,大多是对格罗特观点的细化和深入;齐默恩(Alfred Zimmern)转换视角,更多地从国家制度与文化、文明发展的关系入手,为雅典民主制度写出了一首赞美诗;只有保守的格兰迪(G. B. Grundy),才能在20世纪初年初次对格罗特提出严肃的挑战。欧洲大陆上,杜里伊(Victor Duruy)4卷的《希腊史》精神上接近格罗特,并一度遭遇批评。但据他自称,在格罗特的著作出版后,他的日子好过了

<sup>①</sup> 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 pp. 19~28.

不少。科修斯(Ernst Curtius)和贝洛赫(J. Beloch)的同名著作(*Griechische Geschichte*)各4卷,但篇幅都不小,大多超过两千页,有些甚至超过3000页。科修斯曾长期在德国主持考古发掘,其著作主要是希腊文化史,于希腊景物描写尤其擅长,带有抒情和感伤的韵味;贝洛赫以研究人口问题起家,以解读和批判古代文献见长,观点上更倾向于批判而非赞同民主政治。布佐尔特(Georg Busolt)擅长的是希腊政治史,曾写有《拉凯戴蒙人及其同盟》(*Die Lakedaimonier und Ihre Bundesgenossen*)、《希腊人的国家》(*Griechische Staatskunde*)等重要著作,其《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以学术性知名,对资料的批评和观点都很有可观,但该书同样篇幅宏大,原本计划写到喀罗尼亚战役,但写了3卷4册,只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迈耶(Eduard Meyer)的《古代史》(*Geschichte des Altertums*)有5卷,其相当部分与古希腊史有关,但也只写到公元前4世纪初。

然而,上述这些著作多附有大量注释,包含众多资料批判和学术史探讨的内容,是地道的研究性专著。阅读这样的著作,不仅耗时,考验一个人的忍耐力,而且需要有比较扎实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基础,它们的读者,多数只能是那些专业研究者。可是,大量的社会读者,包括学校中学习古典学的大学生们,显然无此能力和条件。因此,社会需要一部篇幅适中、能够反映学术进展的单卷本希腊史。

有意思的是,完成该任务的居然是伯里。所以用“居然”,是因为伯里当时并不以希腊史研究见长。他生于1861年,4岁开始学习拉丁文,10岁开始学习古希腊语,后来还学了包括俄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在内的多种语言。他大学时的专业是古典文献学和道德哲学,但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勃朗宁。1882年,他以优异成绩从都柏林大学毕业,1885年成为该校教师,1893年年仅32岁时晋升为教授。他虽然校勘和编辑了优里庇德斯和品达的作品,但并不以希腊史见长。确立他在史学

界声誉的,是他的晚期罗马帝国史研究。1889年,时年不过28岁的他出版了两卷的《晚期罗马帝国:从阿卡狄乌斯到爱里尼》(*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后来还陆续出版了《东罗马帝国史:从爱里尼垮台到巴塞尔一世登基》(*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from the Fall of Irene to the Accession of Basil I*)、《晚期罗马帝国史:从提奥多西一世之死到查士丁尼之死》(*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把东罗马的历史从罗马帝国分裂一直写到9世纪中期。此外,他校勘和注释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为这部名作锦上添花。除晚期罗马帝国外,他还涉足西方思想史,写有《思想自由史》(已有中译本。宋桂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和《进步的观念》(已有中译本。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和《圣帕特里克传》。他主编了《剑桥古代史》,参与了《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的写作与规划,可能是英国学者中唯一同时为剑桥的三部历史写稿的学者。在希腊史领域,他最主要的著作是1909年出版的《希腊历史学家》(*The Greek Historians*)。<sup>①</sup>但那是在他写出自己的《希腊史》8年后,受哈佛大学邀请所做的讲座的讲稿。因此,在《希腊史》之前,他不曾写过有关古希腊史的任何专著。

但是,正是这本看似出自外行之手的单卷本《希腊史》,成为迄今为止西方最为成功的学术著作之一。我们只要看看该书重印的次数,便能发现它受欢迎的程度。1900年7月,它由麦克米兰公司初版,当年10月即重印。在1913年该书第二版出版之前,先后重印了8次。第二版推出

<sup>①</sup> 有关伯里生平 and 著述情况,主要参考了下述论著: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第747、760页;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第721~725页;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3~164页;John Cannon, et al. eds.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Histori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pp. 59~60.

后,该书仍广受欢迎,到1951年第三版推出之前,12次重印。哪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它也平均每两年重印一次。1927年作者去世,此后该书陆续推出了修订第三版和第四版,仍然畅销不衰。1975年,该书经罗素·梅格斯(Russell Meiggs)修订出了第四版。新版主要根据考古新进展改写了其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即关于爱琴文明和早期希腊的两章,并增补了参考文献。其他正文一仍其旧,只是在注释中对最近的发展做了说明。修订版似乎更受欢迎,截至1980年,每年重印一次。时至今日,该书仍是西方大学历史和古典学本科教学的基本教材。笔者曾就希腊史教材的版本问题,先后与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格拉姆(A. J. Graham)教授和英国牛津大学罗森博士(Elizabeth Rawson)交流,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虽然哈蒙德(N. G. L. Hammond)和西利(R. Sealey)<sup>①</sup>都各自出版了他们的希腊史,但在教学时,他们仍选用伯里之书作为教材。盖因哈蒙德《公元前322年之前的希腊史》虽然出自权威的希腊史家之手,提供了某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且在脚注中提供了古典文献的来源,但格拉姆和罗森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该书的可靠程度较伯里稍逊。罗森更具体指出,如果你追踪哈蒙德提供的古典文献出处,有时可能会找不到相关记载!西利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古代希腊城邦的,缺少了爱琴文明部分,另外,其框架可能也有不如人意之处。笔者当年初入希腊史之门时,导师胡锺达先生要求我们阅读的,仍是伯里这本书。

在古史学界,伯里此书也得到相当高的评价。古奇认为:“伯里是唯一其他利用大量新资料的人,这部比较简明的总结既有科学性,又有通俗性,是一篇出色的导论。”<sup>②</sup>汤普逊评价道,“这位拜占廷学者站得高看

<sup>①</sup> 分别是*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2nd ed. 1967和*A History of Greek City-States 700—338 B. 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sup>②</sup>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747页。



得远,写了一本最好的古希腊史教程。”<sup>①</sup>1951年该书修订第三版出版时,知名古史学家卡瑞甚至认为,经历50年之后,尽管希腊史研究已经转向社会和经济领域,但这部以政治和军事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似乎变成可以与格罗特的《希腊史》比肩的经典了,因为伯里“兴趣的范围超越了他的时代,总体上恰当地处理了希腊文明的多样性”。<sup>②</sup>此后,尽管西方出版了不少单卷本的希腊史著作,如波麦罗伊等的《古代希腊:政治、社会与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莫里斯和鲍威尔的《希腊人:历史、文化和社会》(格致出版社,2014年)等,在诸多问题上,吸收了20世纪以来古希腊史研究多方面的成果,特别是在早期希腊史和公元前4世纪部分以及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成果,使希腊史变得更具综合性,但伯里这部著作仍未失去其价值。

古代希腊的历史到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以何者为主线,在伯里的时代,甚至在今天,都不是不言自明的。以公元前4世纪为例,《剑桥古代史》第1版的第6卷是把那个时期作为希腊城邦衰落、马其顿统一希腊的时代;而该书第2版彻底颠覆了这个框架,希腊大陆不过是爱琴海世界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波斯、埃及、迦太基和黑海地区等,都先后被纳入进来,城邦此时并未衰落,马其顿的扩张,则被视为利用了此前希腊人某些创造的结果。伯里从20世纪初年就多少留意到希腊世界的多样性问题,把古代希腊人而不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人作为他的中心,注意在希腊大陆之外,适当纳入其他地区的历史,包括小亚细亚、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的历史,对这些地区的地位和影响,都给予了适当的注意。在上下时限问题上,众所周知,在伯里写作希腊史之时,迈锡

①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下卷第四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24页。

② M. Cary, "Bury's History of Greece Revised",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 2, No. 3/4 (1952), p. 191.

尼文明虽然已经被发现了 20 多年,但一些重要的遗址如派罗斯等仍深埋地下,线形文字 B 尚未公之于世,克里特文明还等待着伊文斯去发掘,有关的研究尚未充分开展。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伯里敏锐地意识到,史前希腊将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因此他在《序言》中告诫读者,他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暂时的。有关的描述,只能是一些主要的特征。尽管如此,他仍力所能及地对史前希腊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描述和归纳。至于下限,伯里大体尊崇 19 世纪以来的习惯,将其确定在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之时。选定这个时间为下限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希腊城邦独立的丧失,西方人所欣赏的希腊城邦的自由与民主,逐渐从历史中隐退。希腊化时代各君主国的相互混战及其被罗马征服的历史,如古奇曾经指出的那样,无论对格罗特,还是对伯里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都难以写得精彩。喀罗尼亚战役不仅意味着希腊霸权在雅典、斯巴达和底比斯之后落入马其顿人之手,而且落入了非希腊人(马其顿人被希腊人视为外国人)之手。尽管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希腊人可能并未马上意识到希腊城邦和独立从此终结,但希腊历史自此和城邦时代告别,则是事实。伯里的选择,至今仍是众多希腊史学者的一般选择。

其次是地域上的取舍。他明确指出,因为文献的缺失,古风时代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历史显然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实际,读者必须注意此时小亚细亚、西西里和大希腊的希腊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虽然在有关古风时代的 4 章中,雅典和斯巴达占了 3 章,但第二章大体交代了古风希腊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在有关雅典和斯巴达的三章中,除叙述两邦早期的历史外,分别涉及立法运动、僭主政治、泛希腊性质的赛会、小亚细亚的理性主义等内容。到古典时代,撇开有关希波战争的两章不论,雅典占据了公元前 5—前 4 世纪即一般所说的古典时代的中心。关于公元前 5 世纪的 4 章,基本都与雅典有关。但在有关公元前 4 世纪

的各章中,斯巴达、雅典、底比斯、叙拉古和马其顿轮番占据舞台中心。色萨利和卡利亚的试验,也吸引了他的注意。伯里甚至认为,希腊历史的中心或者未来属于这些地区。他把西西里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即整个希腊历史一部分的做法,而非打断正常叙述的孤零零的一或两章,尤其值得称道。<sup>①</sup>虽然弗里曼(Edward A. Freeman)和后来的德国学者霍莫(Adolf Holms)等人都曾写出过专门的西西里史,但如何把西西里纳入希腊历史的总体框架,至今都仍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伯里是西方较早认识到西西里历史重要性的古史学家。他对整个著作大纲的安排,应当说大体符合历史的实际,既反映了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特征,也照顾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历史多中心的现实。

第三是内容上的取舍。在今人看来,一部综合性的古代希腊史,当然应包含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个方面。伯里也承认,经济和文化,特别是文化对古代希腊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限于篇幅,他只是偶尔涉及,而以政治和军事史为主。这里有19世纪史学传统的影响,也有篇幅上的考虑。如果把希腊人文化上的成就纳入,有关哲学、文学和艺术的讨论不免占去大量篇幅,反会冲淡政治史的主题。所以在其《序言》中,伯里宣布,他只会触及那些与政治史联系特别密切的宗教与文化现象。从全书的布局看,伯里大体遵守了他给自己确定的原则,但有关宗教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关键的阶段,如俄耳菲斯主义、伊奥尼亚的理性主义、伯里克利时代的智者运动、亚里士多德等,仍然出现在了本书中,有些是作为政治变迁的原因,有些是作为政治变迁的结果,是政治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处理,虽然可能对希腊人不够公正,更不能让今人感到完全满意,但强化了该书的核心框架,让它具有了修昔底德的风格:集

<sup>①</sup> Ronald M. Burrows, "Bury's History of Greece",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 14, No. 9 (Dec., 1900), p. 462.

中在自己的主题上,其他所有内容,无论多么有趣,一律舍弃。该书一直受到推崇,这也许是重要原因之一。

尊重文献,叙事平实,可能是该书最显著的特点。伯里可能是朗克主义的信徒,对历史的科学特征笃信不疑,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并在研究中努力实践。科学性的保证,来自对文献的批判和解读。古奇也认为,《希腊史》的优点之一,是对原始文献的利用。文献的充实与否,直接影响到篇幅的分配。文献相对较少的古风时代只有4章,以大体交代历史线索为满足。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文献相对充分,不可避免地成为叙述的中心。但是,他并未让公元前5世纪的篇幅大得遮蔽其他时代。到公元前4世纪,非雅典的文献逐渐增加,同时也因为历史中心在不断转移,其他地区得到的篇幅相应增加。不过伯里对于文献并不是一味轻信,他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这里以第三章关于早期斯巴达历史的论述为例略做说明。

有关早期斯巴达的古代文献稀少,同时代的文献几乎没有,后代的记载因为所谓的斯巴达奇迹的干扰,存在对斯巴达严重理想化的倾向,但关于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论述,颇有文献传世。因此,该章的论述以斯巴达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为中心,他首先概述了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接着是对美塞尼亚的征服及其影响,以及斯巴达政体与克里特政体的比较。在这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色诺芬等人的影子。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伯里认为斯巴达政体具有混合性质,其中包含着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并且把它与克里特政体进行了比较。准此而论,他的观点与古代文献没有本质冲突。但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体现了伯里的洞察力。关于监察官的权力,他认为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们最初本为国王指定的、分担司法职能的官员,在平民与王权和贵族的冲突中,他们的权力逐渐增强,到公元前7世

纪才赢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其典型表现,是监察官与国王之间誓言的交换。所以,监察官具有民主特征,是人民的代表。至于斯巴达混合政体形成的原因,伯里承认那是斯巴达保守的结果,但觉得斯巴达与其他希腊城邦的差异,在于当其他城邦废止王政时,斯巴达削减了国王的权力;在其他城邦走向民主时,斯巴达确实授予了人民代表巨大权威,但仍保留了世袭王权和贵族议事会。关于斯巴达和克里特政体,他认为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克里特政体中没有任何民主色彩。他看到斯巴达的制度与风俗与其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又认为不仅如此,因为在古代希腊人看来,斯巴达那种政体最具简朴而完善的美感。斯巴达政体所以得到希腊人无限的景仰,正在于此。

持论平允,少有惊人之论。作为一部面向社会和大学生的教科书(该书最初就是作为教科书出版的),将希腊历史的轮廓用平实的语言叙述出来,当然是最重要的。全书的主体是叙事,将古代希腊人的历史,从史前按部就班地一直叙述到亚历山大大帝之死,其中包含大量具体的史实。如前所述,在叙述时,他更愿意用希腊人的资料来叙述希腊史。关于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他基本遵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尤其是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他几乎亦步亦趋地追随了修昔底德。不过希腊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并无定论,有些问题上的争论还相当激烈。对一些问题,例如对雅典民主的评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责任与交战各方的战略,对智者的评价,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推崇,不免涉及价值判断。在这些地方,伯里从他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确实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在雅典民主政治问题上,他大体追随格罗特,对伯里克利多有推崇,对雅典的扩张行动不乏肯定;对智者,则指出他们的坏名声,可能来自社会的偏见,完全是非历史的,因为他们传播了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希腊人

的知识,虽然相互之间观点很有差异,但“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启蒙的传播者”。对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他显然充满了钦佩之情,“在推翻三十僭主后,民主派的政治家在处理他们遇到的困难时,显示了智慧和稳健,与其他希腊人国家在面对类似危机时的暴力和复仇恰成对照。”民主政治恢复后的大赦,有助于民主派和寡头派的和解,“特拉叙布鲁斯(Thrasylbulus)和他的同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策略和智慧,是对他们国家最大的贡献。再无任何寡头派阴谋威胁到雅典国家内部的和平;再无任何公民——如果他不是一个哲学玄想者——会质疑民主政治。”对于雅典人判决苏格拉底死刑,他像格罗特一样,认为苏格拉底本是民主政治的产儿,在回应指控时不够完美,所以根据雅典法律,对他的判决并无不当,“没有比苏格拉底更好的人,但他的控告人也是完全正确的”。它表现的是“古老秩序的精神对个人主义兴起的抗议”。<sup>①</sup>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问题上,他指出仅战争名称本身,就显示了历史学家对雅典的同情,因为修昔底德从未使用过这个称呼。在伯罗奔尼撒人看来,这场战争也许更应该称为“阿提卡战争”。对于战争责任,他指出,雅典决心不顾希腊的反对维持自己的海上帝国,在这个意义上她应当对战争的爆发负责。但仅此而已,雅典根本没有征服和统治全希腊的意图和野心,更不能说雅典政治领袖为摆脱国内危机,蓄意发动战争。至于伯罗奔尼撒方面,他认为科林斯是主要煽动者,斯巴达不过是个三心二意的领袖,被盟友的鞭子赶着前行。这种各打五十板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修昔底德说法的伯里版本,今天的不少学者可能不会太赞成,但支持者,即使在今天,可能也不会太少。甚至在论及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时,伯里似乎仍保持了她的平常心。他认为远征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

---

<sup>①</sup> J. B.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2<sup>nd</sup> ed., London: Macmillan, 1913, pp. 566, 573.

疯狂,所有条件都有利;雅典人的向西扩张,是其控制东部地中海地区后的自然行动。它所以失败,是因为雅典人错误地把它委托给了尼西阿斯以及召回亚西比德,它表明雅典的政体或者运作确实有些问题,而依赖公民大会指挥这样一场远征,也的确对远征失败产生了影响。对于指挥远征的尼西阿斯,他承认此公是一个勇敢的士兵,一个和蔼的人,但作为政治家和将军,都过于腴腆,且受到迷信的影响,“如果脑子更好一点,他也许就不会让他的国家灭亡了。”对于雅典人远征叙拉古的失败和全军覆没,“雅典人的悲剧性命运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如此深刻的同情,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同情因解放而欣喜的叙拉古的儿子们。但他们值得我们同情,他们已经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考验,消灭了强大的、意在剥夺他们自由的人侵者”。<sup>①</sup>后来,他还谈到了西西里钱币打造技术的完美,并将其与希腊本土的历史加以比较。在其他众多问题上,伯里的看法大体相类,表现得似乎不偏不倚。相对平允但不乏精彩的论证,可能是该书受到欢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希腊史》出版至今已 100 多年。在此期间,希腊史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新进展,<sup>②</sup>其中最明显的是在早期希腊史领域。爱琴文明研究有了长足发展。1900 年,伊文斯发现了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宫。此后,英国考古队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者先后在克里特和爱琴海中的岛屿上,发现了大量的宫殿遗址和文物,揭示出一个全新的文明。伊文斯还根据克里特文物与埃及和西亚文物的对应关系,对克里特文明做了开创性的研究,确立了它的年代学框架。在希腊大陆上,1939 年布列根在派罗斯的发现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发现了传说中的所谓涅斯托尔的王宫,以及大量泥版

<sup>①</sup> J. B. Bury,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 467.

<sup>②</sup> 有关 20 世纪以来希腊史研究的进展,请参看拙著《古典历史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以及黄洋与笔者合著的《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文书,并将它们公之于世,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最为充分的第一手资料。1952年,英国年轻的建筑工程师文特里斯(M. Ventris)与剑桥大学的柴德威克(J. Chadwick)合作,成功解读了迈锡尼的线形文字B,从而把爱琴文明研究置于牢固的文献和考古基础之上。关于荷马与迈锡尼世界的关系,如今的人们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荷马的描写,更多地代表着古典希腊文明的起点而不是爱琴文明的残余。关于古风时代的希腊,如今人们关注的是希腊城邦的形成。东方文明对希腊的影响,近20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在阿尔米那和塞浦路斯等地的发掘,表明希腊与东方的联系,可能早在公元前9世纪就已开始,远早于伯里设想的公元前7世纪,其影响的路径,也不仅仅是通过吕底亚,还应包括西亚和埃及。关于希腊金属钱币产生的年代,因为新的定年方法的采用,也被下移到公元前6世纪。亚里士多德有关梭伦币制改革的记载,为考古证据所否定。在古典希腊史领域,20世纪上半期麦瑞特(B. D. Meritt)等人有关雅典帝国贡金的研究,让我们对雅典帝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升。琼斯、芬利等人有关古代经济和政治的新看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典民主政治一贯的恶劣形象。20世纪后期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城邦危机的研究,也部分改变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黯淡无光的历史图景。但总体上看,伯里有关古风和古典时代希腊历史的总体框架,仍然是合理而且具有说服力的。哈蒙德《公元前322年以前的希腊史》并未能取代伯里,西利的《希腊城邦史:公元前700—前338年》更无此可能。最近出版的波麦罗伊(Sarah Pomeroy, et al)等撰写的希腊史,确实汲取了20世纪以来的新成果,也更具综合性,把经济、妇女和家庭等内容纳入历史之中,并把古代希腊的历史叙述到了希腊化时代末期。在编写方法上,也借鉴了伯里的某些做法。但伯里对政治史和希腊历史总体进程的把握,对中国的读者来说,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 序 言

在确定本书的形式和特征时,我坚持两条基本原则。其一,当撰写一部以原始材料为基础的历史著作时,为了充分展现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独到认识和见解,人们理所当然地很容易将其写成洋洋洒洒的多卷本鸿篇巨著。但事实上,将其压缩成为篇幅适中的单卷本,或许更加适用。鉴于此,当我们撰写一部全新的希腊史时,这种尝试虽然更费心力,但似乎很有价值。其二,就历史而言,那些能够吸引具有专业素养学者兴趣的著作,在我看来,也是增长年轻学者学识见闻的最佳素材。因此,虽然我的目标是针对教学,但本书面对的读者并不只是学生,因而不受教材或大学学科的限制,所涉猎的范围将更加广泛。

鉴于笔者研究所限,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只有当上述内容与本书研究主题——政治史——密切相关或能直接阐释该主题时,笔者才会对上述内容有所涉及。虽然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笔者有时会随意阐发,不受此原则的限制,但本原则似仍可推而广之,因为如今我们已能轻松获取诸多精深的艺术、文学、哲学研究著作。在一部简短的政治史著作中,散布着几处相互间没有太大关联的讨论艺术和文学的章节,虽然这些讨论很有必要,但就艺术和文学而言,难免显得草率而拙劣,因而这些章节既无太大用处,也缺乏艺术性。